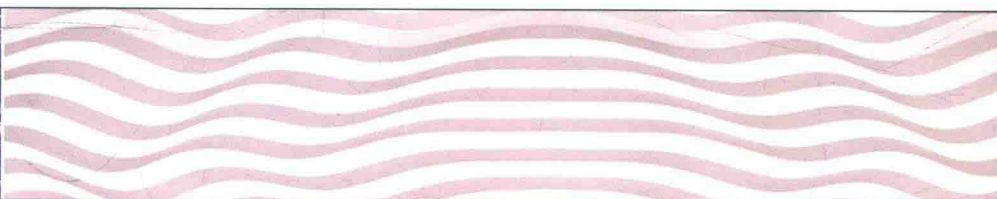


北京交通大学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系列丛书

知行的意蕴与价值

——北京交通大学校训研究

孔德立 张安梅 李世珍 周耿 袁芳◎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http://www.bjtup.com.cn>

北京交通大学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系列丛书

知行的意蕴与价值

——北京交通大学校训研究

孔德立 张安梅 李世珍 周 耿 袁 芳 著

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校训建设的意义谈起,梳理了中国大学校训的起源与发展,分析了当前大学校训建设取得的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梳理了古代知行观的演变,揭示了传统知行观的重要内涵,以及知行观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本书同时讲述了北京交通大学校训的来源和变迁史,以及知行校训对北京交通大学发展的意义和影响。

本书可作为教育文化界工作者的参考书。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行的意蕴与价值:北京交通大学校训研究/孔德立等著. —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6. 9

(北京交通大学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系列丛书)

ISBN 978-7-5121-3006-7

I. ① 知… II. ① 孔… III. ① 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 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8531 号

知行的意蕴与价值——北京交通大学校训研究

ZHIXING DE YIYUN YU JIAZHI——BEIJING JIAOTONG DAXUE XIAOXUN YANJIU

责任编辑:叶 霖

出版发行: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

电话:010-51686414 <http://www.bjtup.com.cn>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高粱桥斜街 44 号 邮编:100044

印 刷 者:北京艺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 mm×235 mm 印张:9 字数:120 千字

版 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21-3006-7/G·1096

定 价:32.00 元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向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质监组反映。对您的意见和批评,我们表示欢迎和感谢。
投诉电话:010-51686043, 51686008; 传真:010-62225406; E-mail: press@bjtu.edu.cn。

“北京交通大学文化建设研究成果系列丛书”

编 委 会

顾 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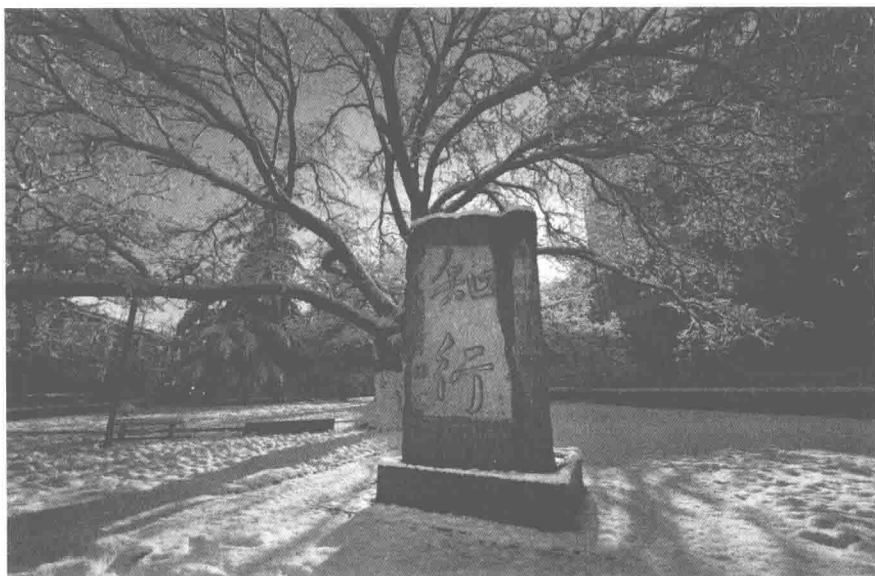
曹国永 宁 滨

主 任：

高福廷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鹏玉	马 强	王 璿	王金华	王雪松
王德瑜	毕 颖	衣立新	许安国	孙长索
杜永平	李士群	李长春	李国岫	杨培飞
宋守信	张立学	屈晓婷	赵 鹏	荆 涛
姚念龙	秦思阳	董海荣	韩振峰	蓝晓霞
路日亮	翟 儒	戴胜华		



位于北京交通大学思源楼北面的“知行”校训碑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中国大学校训的源流与反思	1
第二章 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变迁及现代意义	20
第三章 北京交大“知行”校训的来源	58
第四章 百年交大校训变迁史	79
第五章 知行校训与北京交大发展新成就	94
第六章 多措并举推进校训内化于心与外现于行	108
第七章 知行校训的社会影响	117
结语 致知力行——北京交大校训“知行”新诠释	124
参考文献	128
后记	132

第一章 中国大学校训的源流与反思

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场所，其基础设施、师资力量、学科建设固然是衡量办学水平的基本要件，但只有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要想培养出德才兼备、科学与人文精神集于一身的优秀人才，就必须特别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

校训、校风、校徽、校歌、校赋等体现了一所学校的文化底蕴与精神风貌，是衡量一所学校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准。校训作为校园精神的凝练表达，更能代表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与精神。关于校训的定义，学术界与教育界的说法尚未统一，笔者赞同以下说法：“校训，是指学校确定的对全体师生员工具有指向和激励意义的、体现学校办学理念和价值追求的高度凝练的词语或名言。就校训本质而言，它是学校历史与传统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是校园精神与育人理念的航标和旗帜，是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凝练和概括，是大学宗旨与社会文明的彰显与体现。”^①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校训与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一样，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而是从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但因其文化土壤仍为中国特色，所以，在大学校训确立与发展过程中，亦有中国文化的特色。欲了解今日大学校训之由来与问题，必先从古代的教育说起。

一、中国古代“校训”的起源

《辞海》中有“校训”一词：“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

^① 韩延明，徐懋芬. 大学校训论析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16.

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为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解释“校训”为：“学校规定的对师生有指导意义的词语。”在古代文献中，没有独立的“校训”一词，一般表述为“学校训导”。在《说文解字》中有“训，说教也”。《古代汉语词典》释“训”为“法则、教育”，一般组成“训辞”“训导”“训典”“训诂”“训诱”等词语。《明史·志第四十六·选举二》记载：“国子生及府、州、县学生员之学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举性资敦厚、文行可称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教生徒……”由此可见，“学校训导”是对有培养前途的学生、候补官员进行训导与教育，使之进一步符合国家需要的教育行为。

“校训”发源自先秦时期，当时虽然尚未出现“校训”一词，但其表述教育主旨之内容已经出现。《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中国早在夏代就出现了学校。夏、商、周三代学校的名称虽然不同，但其人才培养目标却是一致的，即“明人伦”。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与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可见，古代学校分为小学与大学两个阶段，所学内容不同，对学生的规范与要求也不同。“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大学之道，既是大学的培养内容，又是国家对大学生的训导与规范。

孔子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他有教无类、兴办私学、广收门徒。《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以孔子为核心的儒家集团为中国文化的传承做出了杰出贡献。那么，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有没有提出“校训”？《论语》二十篇中哪些句子可以作为孔子学堂的“校训”？这个问题显然不好直接回答，但我们从孔子教弟子以仁、

礼为主要内容的修己安人之道来看，孔子的训导以修身为基础，以安人为实现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途径。可以说，通过教育与个人的努力，使自己成长为一个道德完善的人，一个行为正直的人，一个具有高度责任感与社会担当精神的人，这就是孔子教育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主旨。这个思想主旨在西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之后，自然而然地也成为古代教育的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孔子学堂的校训可以概括为“修己安人”。

在科举制时代，国家教育以儒学为主要内容，其训导思想体现了浓重的儒家思想特色。唐代末期，读书人为躲避战乱等，选择到山林等清净地读书，后发展为聚众收徒讲学，常以书院命名读书讲学之地，一种新的教育形式——书院逐渐发展起来。书院融文化传承与人才培养于一体，在宋代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确立下来。到了南宋时期，随着宋代理学思想的推动，民间讲学之风大兴，书院也逐渐兴盛起来。宋代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应天书院。这四个书院合称为“中国四大书院”。

伴随着书院的兴盛，正式的学规也开始出现。学术界一般认为，《白鹿洞书院揭示》即为中国最早的学规。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创始人为南唐时期的李渤。李渤养了一只白鹿，终日与之相随，李渤因此得一雅号“白鹿先生”。后来李渤就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于庐山五老峰南麓修建亭台楼阁，疏引山泉，种植花木。由于这里山峰回合，形如一洞，故取名为白鹿洞。后因战乱频繁，书院活动被迫中断。公元1179年（南宋淳熙六年），理学大师朱熹知南康军，白鹿洞书院正属于朱熹管辖范围。朱熹本来对民间儒学的推动有极大的热情，他视察白鹿洞书院时，见书院破败，草木凋零，便指示官员修复书院，并亲任洞主。书院复建完成后，在行开学礼之前，朱熹提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之间，作为院中诸君共同遵守的学规”，从而诞生了《白鹿洞书院揭示》，也就是

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学规》。



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麓的白鹿洞书院正门

《白鹿洞书院学规》全文 200 余字，现录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白鹿洞书院学规》分为五个部分：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其首要任务是要学生懂得“五教之目”：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次是知晓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最后是修身、处事、接物之要旨。不难看出，学规浸润着丰厚的儒家思想，也可以说是儒学核心价值的体现。

“五教之目”出自《孟子》，后来董仲舒把它表述为“五伦”。“五伦”对应“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五伦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五种人际关系，五常是中国人最基本的五种道德。从《白鹿洞书院学规》可见，宋代的书院教育把培养有道德的人放在教育的首要位置，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育要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学规》，其教育宗旨、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教育方法，对于推动当时的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加之朱熹的影响力，《白鹿洞书院学规》很快被其他书院所效仿，一时成为南宋时期书院统一的学规。公元1246年（南宋淳祐六年），宋理宗下诏，把《白鹿洞书院学规》颁布于全国各州府县，使之正式成为全国书院的学规。此后，元明清三代都把此学规视为标准，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更是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夫为学之方，白鹿之规尽矣。”

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古代的校训以《白鹿洞书院学规》为开端。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邓洪波先生在其《中国书院学规》中说：“一院（白鹿洞书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而随着中国书院制度之推广，它还传至朝鲜、日本，不仅当年奉为院规、校训，至今尚有高揭吟诵以警学子者，其影响既深且远。”亦有学者指出，学规虽比不上现代校训精练、含蓄，但这并不影响其作用。学规、学则就是校训的雏形。换句话说，校训是由学规发展而来的。数百年发展变迁，万变不离其宗，因其历史的延绵源远流长。^①《白鹿洞书院学规》是我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纲领性的学规，不仅对当时及以后的书院教育，而且对官学教育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教育都产

① 梁云福，向绍兰. 中华校训大观[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6.

生过重大影响。

但是,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白鹿洞书院学规》“和现在校训起码在字数形式上就存在很大差别(现在校训有一言一字、一言二字、二言八字、四言八字等形式),同时也有悖于校训的简明定义(校训是一种格言、箴言和座右铭),所以不能直接把它看成是校训,只能是一种办学理念、教育宗旨或办学目标,是校训的主导思想,是校训取材的‘总库’。以后的校训内容多来源于此揭示。”^①上述观点虽然反对把《白鹿洞书院学规》直接作为校训来看待,但亦认可《白鹿洞书院学规》是校训的来源。

如果说《白鹿洞书院学规》字数太长,不符合现代学校的校训表述方式,那么,千年学府岳麓书院的院训“忠孝廉节”可以说与近现代以来大学的校训在表述方式上就没有多大区别了。公元976年(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创立岳麓书院,公元1167年(南宋乾道三年),朱熹来岳麓书院访问,与山长(岳麓书院院长)张栻论学,开书院会讲之先河。朱熹手书的“忠孝廉节”四个大字,亦成为后来岳麓书院代代相传的院训。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先生在其所著的《岳麓书院的历史与传统》一书中提到:“1932年,胡庶华担任校长时,将岳麓书院的石刻院训‘忠孝廉节’和‘整齐严肃’列为湖南大学校训。”因此,可以认为,岳麓书院的“忠孝廉节”四字院训是中国古代成熟的校训。

在岳麓书院院训影响下,后世书院纷纷确立了自己的院训。明代东林党讲学的东林书院,其院训蜚声中外:“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既体现了书院读书为本的特征,又显示了东林党人关心国家大事的社会责任感。此外,江苏南京尊经书院的“立德立言立功立士先立志,有猷有为有守学必有师”,湖北长阳书院的“教化行

^① 王彩霞.试论中国近代大学校训的起源[J].高教探索,2006(2).



岳麓书院

而风俗美，师道立即善人多”，江西有教书院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而后游于艺；修其身齐其家治其国必先正其心”，贵州安顺永宁维风书院的“格致诚正修齐知所先则近道，孝悌谨信亲爱行有余以学文”。这些书院的院训其实就是当时的校训。他们对仗工整，内涵丰富，深刻影响了我国现代大学校训的确立与发展。

二、中国近现代大学教育与大学校训的变迁

中国大学的近代化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一样，是在西方文化的强力干预下被迫做出的改良运动。因此，近代化大学的校训不免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印记，又因其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故而保留了浓厚的传统伦理道德特色。著名教育学家梅贻琦先生论及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源头时指出：“今日中国的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精神又为一事。”这句话，正体现了我国近现代大学创办与发展时经历的痛苦磨难之实情。

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大学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为目的。从西方文化移植过来的大学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由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并不是由中国传统大学逐步发展而来，而是以西方大学为蓝本，辅之以传统文化的特征。所以，中国现代大学带有更多的西方教育色彩。香港中文大学金耀基先生认为：“中国的现代大学是‘横向的

移植’，而不是‘纵向的继承’。”^①因此，从本质上说，中国大学的校训从一开始就不免带有西方文化的色彩。

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最先是通过传教士的传教活动进行的。自明代以来，欧洲来的传教士首先通过西洋的器物让中国人感受到西方玩意的新鲜，然后开始以编撰外语词典、开办学校、设立教堂等活动进行西方精神的传播。但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间不断受到中国文化的抵制与排斥。直到1840年，英国以鸦片战争的方式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打开了西方文化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大门。从此以后，西方文化就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中国大肆地传播。中国人面对从未有过的失败，开始反思失败的原因。最初，中国人认为是武器装备落后，其次又认为是经济落后，再次意识到是制度落后，最后才意识到是思想文化落后。到了这个阶段，西方的大学教育就正式以先进文化的姿态立住了脚跟。

西方国家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大学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学校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校训。例如，1901年美国监理公会在苏州创办的东吴大学，其校训是“Unto a Full Grown Man”，中文意思是“为社会造就完美的人格”或“法古今完人”。^②1905年，上海的圣约翰书院更名为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提出，以“Light and Truth”（“光与真理”）为校训。他说：“本校以为德重于学，此基督教之旨，必当发挥而光大之。”^③在东吴大学与圣约翰大学校训的影响下，教会大学纷纷确立了自己的校训。所以，我们可以把东吴大学与圣约翰大学的校训作为现代中国大学校训的直接开端。

燕京大学是基督新教在北京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1919年正式成立，司徒雷登任首位校长。其校训为“Freedom through Truth for Service”，中文意为“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金陵大学作为南京的第一所教会大学，

① 王彩霞. 二十世纪中国学校校训研究 [D].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30.

② 李翠. 我国大学校训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 [J]. 高等教育研究，2005（1）.

③ 徐以骅. 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 [M].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16.

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刚成立时，该校只有办学宗旨，并无明确的校训，1942年，其确立校训为“真、诚、勤、仁”，后改为“诚、真、勤、仁”。

从以上教会大学的校训来看，其内容既有西方文化内涵，又有中国文化的传统。在办学过程中，教会大学也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分，以更好地实现其在中国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教会大学的创办虽为传教之目的，但在客观上也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为中国自主创办大学提供了借鉴。

民国时期，民族独立与文化自觉意识不断提升。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教育纲要》明确提出：“明示教育趋向，使人人知求学系造就本身能力，用以开发社会无穷事业，非仅供官吏一部分之用。凡从前入学专以干禄之恶习，切宜破除，以养成国民独立之精神。各学校均用此著为校训。”^①这可能是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提出学校的校训建设问题。从这份民国时期的教育文件上可以看出，中国的教育变革已经从以往的“学而优则仕”转为培养每一个人的精神与能力，从此拉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大幕。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试图在全国所有学校使用共同的校训“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939年5月，教育部规定，全国大学使用共同的校训“礼、义、廉、耻”。国民政府的这一做法在当时起到了推动校训建设的作用，但同质化与模式化的校训无疑是对教育个性化发展的限制，也不可避免地湮没了各个学校的办学特色。事情的发展往往不是预先料想的那样，尽管政府有严格的命令，但在实际中，很多学校并未遵从，反而催生了各种各样的新校训。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南洋公学的校训“勤俭敬信”，北洋大学的校训“实事求是”，南开大学的校训“允公

^① 熊明安. 中华民国教育史[M].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0: 9.

允能，日新月异”，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训“刚毅坚卓”，浙江大学的校训“求是”等，这些新校训的出现是当时教育进步的表现，有的校训至今被沿用。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学校训建设

在抗日战争的困难岁月里，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日斗争的人才，在延安开办了战时教育。相比传统教育与国民政府的教育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学校与新式学校的校训显得特别有活力。比如，抗日军政大学的校训“团结、紧张、严肃、活泼”，陕北公学的校训“忠诚、团结、紧张、活泼”，中国女子大学的校训“紧张的学习、艰苦的生活、高尚的道德、互助的作风”等，这些校训简明扼要，容易记住，而且特别催人奋进。当时，全国的有志青年纷纷到陕北投身革命，进入革命大学学习。在这些校训的激励下，他们为民族独立与新中国的建立，奉献出自己无悔的青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大学校训建设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相辅相成。南京理工大学李翬先生认为，校训的发展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批判、动乱与迷失自我阶段；自我意识苏醒阶段；文化自觉阶段。韩延明、徐懋芬又在三个阶段基础上增加了第四个阶段：繁荣阶段。^①

1949—1977年为批判、动乱与迷失自我阶段。这个阶段的大学教育可谓一波三折。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策略，全面倒向苏联。经济建设如此，文化教育也是如此，甚至对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也照搬过来，大学的教学计划、教材、教学大纲也苏联化。根据苏联高等教育的特点，中国在1952年实行了全国院校、院系的大调整，打破原有的大学地域分布、院系格局，组建新的大学与院系。经过这次调整，建立了多所行业化的高校，培养了国家急缺的各项专门人才，改善了高校的

^① 韩延明，徐懋芬. 大学校训论析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39-50.

分布情况。但我们也要看到，调整也带来较为严重的后果，使得原有的综合性大学变为了单一功能的工科大学、农业大学等。

至于校训，改变就更大了。原来高校的校训既有传统文化特色，又有西方新式的思想。但在一切以政治挂帅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下，一切具有传统伦理道德的校训均被视为糟粕与毒瘤，必除之而后快。

以东吴大学为例，其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校训“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真可谓修身立德的好校训。但是，在有些人看来，“法古今完人”不正是鼓动复辟吗？1952年，东吴大学的校训被用水泥封住。1998年，继承东吴大学遗产的苏州大学才打开尘封已久的封泥，使校训重见天日。那个时期，全国大学的校训几乎都离不开“团结、勤奋、刻苦、拼搏、文明、求实、礼貌、严肃、爱国”等富有战斗性、革命性、政治性的口号。当激励做人的校训被封掉的时候，同质化的校训就充斥于全国所有院校，由此带来的教育停滞甚至倒退也就不可避免了。

1978—1989年是自我意识苏醒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逐步恢复正常轨道。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就是著名的“三个面向”教育方针。但由于整个国家教育体制还是延续了以往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从招生考试到就业分配，无不在计划之中。所以，该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还处在改革的准备阶段。其校训也以“团结”“勤奋”“求实”“创新”“严谨”等词语为主，仍然缺乏主体意识与人文精神。校训建设问题并没有多少改观。

1990—1999年为文化自觉阶段。这个阶段，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也逐渐推开，进一步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充分发挥学校办学的主体性。高校的办学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后，校园文化建设也显示出生机与活力。许多大学开始制定富有特色的校训，推进校园文化建设。